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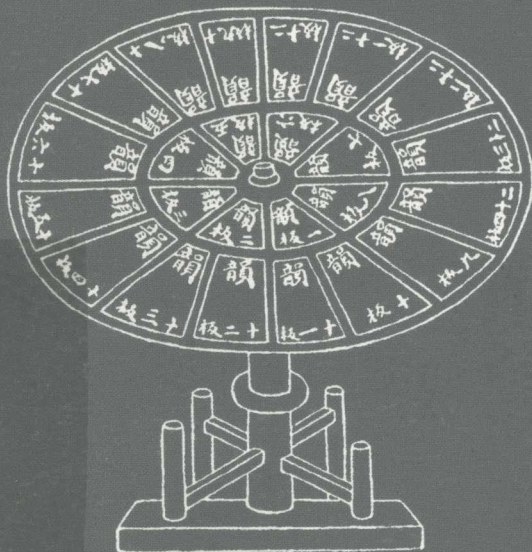
印刷与市场

国际会议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ting and the Book Market

周生春 何朝晖 编

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印刷与市场

国际会议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ting and the Book Market

周生春 何朝晖 编

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周生春, 何朝晖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308-10299-5

I. ①印… II. ①周… ②何 III. ①印刷工业-工业史-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F426.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70504号

“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周生春 何朝晖 编

责任编辑 葛玉丹

文字编辑 陈佩钰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61千

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299-5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言

周生春

版本、书目、印刷技术一直是中国书史或印刷史研究的热点，印刷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深受研究者的关注。与以往不同的是，2009年7月30日至31日，由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ting and the Book Market）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论域拓展、深入到印刷市场这一书史、印刷史与经济史的交叉领域。

由商业出版的出现到商业出版的繁荣，再到全国性书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印刷与市场之间一直是一种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研究印刷市场，对于理解印刷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国内外书史、经济史研究领域近二十位重要学者（到会学者十七人，提交论文十九篇），围绕“印刷与市场”这一主题，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出发，由“版刻与印数、销售市场、成本价格、从业群体”等论题入手，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印刷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不仅发掘出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更是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经济的层面。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版刻与印刷术的传播及其影响

姚伯岳研究馆员的《论覆刻本》一文对覆刻本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点与价值。杜泽逊教授的《木鱼书刊刻年代小考》一文对《木鱼歌叙录》里280种木鱼书的刊刻年份一一进行了考察。

肖东发、卞卓舟教授的《印刷术的西传及其在东西方作用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很长时间后以宗教印刷品、纸牌和纸币等为媒介经

由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古登堡总结了欧洲人运用中国木板印刷与木活字印刷技术的经验，进而在活字材料的选择和制造、油墨的制造、印刷设备的选择、熟练印刷技工的培养等方面实现了金属活字技术的突破（而非发明）。文章认为印刷术之于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是维护文化统一的重要工具，也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印刷术之于欧洲的影响则是促进了新学问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形成，促进了宗教改革主张的传播，也促进了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发展。

二、刊印成本、书价与市场

中国近代以前书籍的刊印成本和价格是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周生春教授在《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一文推算出刊于南宋绍兴、嘉泰间《小畜集》、《续世说》、《大易粹言》、《汉隽》、《二俊文集》和《（嘉泰）会稽志》等六书的页均印造价格平均3.402文足，略高于元后至元五年《十七史》的32.250文足。南宋六书的页均书板价平均1302.703文足，略高于《十七史》、《金陵新志》的平均数中统钞9.090两银。元代二书的页均刊刻成本为中统钞5.570131两银，似低于南宋。宋代以降，雕版图书的页均印造价、页均书板价和页均刊刻成本似呈下降趋势。抄本的页均现售价低于雕版页均现售价而高于赁板页均印造价，是赁板钱得以流行，手抄本与刊本的长期并存的主要原因。而短期内大印数需求的缺乏，则是活字与雕版长期并存，无法取代雕版的主要原因。

Kai-wing Chow（周启荣）教授在《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一文中推算，明代起码从万历时开始，单册和中下档的新出的刊本价格不超过1两银。科举、大众娱乐及实用的书籍相对便宜。多卷数、多册数或多精美插图、印纸装订质量较好的书籍价格在1两银以上，则主要是针对高端读者与藏书家。该文认为，刊本售价相对于当时物价并非特别高，一般读者在1两银以下的范围内有较多选择。

Joseph Dennis（戴思哲）副教授独辟蹊径，以明代的地方志为例，在“Financial Aspects of Publishing Local Histories in the Ming Dynasty”一文中推算出明代地方志的页均成本在0.091两银至0.437两银之间浮动，其均值为0.201两银。李国庆研究馆员的《明末江浙地区雕版刻工合作形式及其生计例说》一文指出明末江浙地区刻工刻书的平均卷数十卷以上及一二卷以下者最多，而六七卷者最少，刻工一

人独立承雕最多，江浙地区刻工最多，外地刻工最少。刻工的月工资在嘉靖年间可以勉强养家糊口，在万历年间则较为富余。按其推算，刻工雕刻印版文字，每千字工价 0.5 两银；书工缮写版样，每千字工价 0.4 两银；将木料加工成印版（即锯成长方形），每块加工费 0.40 两银。

此外，宋平生研究馆员在《清代刻书与售书价格丛拾》一文中将二十余年来积累的有关刻书与售书价格的资料，以清代为限，以出版时间为序，联缀成篇。陈谊博士的《1913 至 1935 年间中国书籍雕版之工价——以刘承干嘉业堂刻书为例》一文则提供了刘承干嘉业堂刻书工价的重要资料。

三、印数与书籍市场

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印数长期以来亦是一个模糊的问题。何朝晖教授在《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推算，雕版可一次性连续刷印的最大数量，约在数百部之内；雕版之累计最大印数可至万部以上。该文还区分了实际印数与最大印数，认为多数情况下，单次实际印数一般在几百部或千余部上下，视需要可再继续加印，短时间内密集刷印数千上万部的情况较为少见。此外，该文还指出，雕版古籍生产周期一般至少在数年以上。

大木康教授在《明末画本的兴盛及其背景》一文从印刷市场细分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明末“画本”（以图像为主体的书籍）在当时的定位，指出画本不同于以“通俗”为目的的图解，而是一种相当高级的出版物，针对的是可以支付高额金钱的高级读者。但该文同时指出，相较于如《顾氏画谱》中通过人际网络便能鉴赏到秘藏的绘画的人以及《唐诗画谱》、《诗余画谱》中不透过绘画的帮助也能够鉴赏诗词的人，“画本”的读者又是较低层次的。因此，“画本”的市场定位可视为以所谓中间层读者为取向的出版物。

Ann E. McLaren（马兰安）副教授的“Written for the Ear: Audiences and Regionality in the Market for Plays in the Ming Period”一文重点考察了小说与戏剧在不同市场的出版情况。该文指出，明朝中后期的书市上多见一部作品多个版本的情况，而出版的小说和戏剧中更是经常可以看到方言的存在。对于戏剧来说，目标市场的地域对于曲调、音韵、语域，甚至是情节推进的选择都起着重大影响。

Robert Culp（高哲一）副教授在“National and Regional Print Markets at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Era: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Dynamic Relation”一文中将书籍

市场分为全国市场与地方市场。该文指出，明后期以前，各大印刷出版业繁荣的城市如杭州、苏州等均为全国各地的读者提供着类似的印刷刊物。至20世纪初，上海作为印刷出版业中心逐渐兴起，在供给全国范围的消费者的同时，各地区性的印刷中心城市也为各地读者提供了带有地方特色的读物。该文以上海、广东为例，分别考察了全国市场和地方市场的印刷出版情况。

范金民教授在《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一文中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各地唐船赴日所载商品中多有书籍，并非只有“南京船”运载书籍；至康熙二十三年中国对日贸易合法化后，书籍更成为主要的大宗商品，其中以上海、宁波和乍浦出发的唐船所装载的书籍数量为最。该文亦考察了江南地区拥有日本销场的原因及出口书籍的主要种类。

四、从业者与市场

Michela Bussotti（米盖拉）副教授的“Few Notes about Huizhou ‘Economies’ of Book”（《试论徽州“图书经济”》）一文论述了徽州的家刻与坊刻的出版状况，包括出版的书籍与出版商，认为在明以后，坊刻相对于家刻来说，各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并考察了坊刻出版的主要书籍。Lucille Chia（贾晋珠）副教授在“Publishing Activitie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Sūtra Printshops（*jīngfāng* 经房/经坊）”一文中专门讨论了宗教出版物与经坊的问题，认为宗教性刊物数量庞大，且其序文中往往附带有出版商资料、出版数量、原始木版的情况等宝贵资料。袁逸研究馆员在其《历代文稿征集考析》一文中详述了宋、元、明、清各代出版商征文征稿的史实及民间各类征文征稿现象，介绍了其内容、特点、目的等。

Joseph McDermott（周绍明）教授的“*How to Succeed Commercially as a Huizhou Book Publisher, 1500—1644*”一文归纳了徽商在明中后期印刷出版业取得成功的六项条件：（1）在木材、稻米等行业的长期运作累积了大量的财富；（2）能比较方便地获得尽可能多的木版、纸张、墨水等印刷所需的原始材料；（3）获得足够的各类技工与一般工人；（4）获得足够的且能应对并满足市场需求的书籍；（5）重于刻印古代以及本朝已故作者的书籍；（6）注重在外省地区对所出版的书籍的宣传。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成果丰硕、十分成功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不仅发掘出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而且围绕“印刷与市场”这一主题，集

中探讨了中国近代以前雕版印刷的刊印成本、书价、销售与市场等问题，填补了中国书史和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空白。尽管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与会学者在印刷术的西传等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学者们又在许多方面，如自宋至清末乃至民国雕版印刷的刊印成本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认为宋代以来刊印成本和书价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人工成本则呈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与会学者的不同学科背景为研究前近代中国的“印刷与市场”提供了多重视角，这不仅使与会者在会上因互相启发而获益匪浅，而且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与资料。

在研讨会闭幕两年后，由于万邦集团的资助，会议论文得以送交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对研究中国“印刷与市场”的学者来说是件好事。希望论文集的出版能有益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为序。

周生春

二〇一一年八月于杭州

目 录

序 言·····	周生春	1
----------	-----	---

版刻与印刷术的传播及其影响

论覆刻本·····	姚伯岳	3
木鱼书刊刻年代小考·····	杜泽逊	16
印刷术的西传及其在东西方作用的比较研究 ·····	肖东发 卞卓舟	37

刊印成本、书价与市场

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	周生春 孔祥来	55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	Kai-wing Chow (周启荣)	73
Financial Aspects of Publishing Local Histories in the Ming Dynasty ·····	Joseph Dennis (戴思哲)	92
明末江浙地区雕版刻工合作形式及其生计例说·····	李国庆	157
清代刻书与售书价格丛拾·····	宋平生	182
1913 至 1935 年间中国书籍雕版之工价 ——以刘承干嘉业堂刻书为例 ·····	陈 谊	196

印数与书籍市场

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	何朝晖	205
明末画本的兴盛及其背景·····	大木康	222
Written for the Ear: Audiences and Regionality in the Market for Plays in the Ming Period·····	Ann E.Mclaren (马兰安)	234
National and Regional Print Markets at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Era: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Dynamic Relation ·····	Robert Culp (高哲一)	261
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	范金民	291

从业者与市场

试论徽州“图书经济”·····	Michela Bussotti (米盖拉)	315
Publishing Activitie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Sūtra Printshops (jingfang 经房/经坊)·····	Lucille Chia (贾晋珠)	333
历代文稿征集考析·····	袁逸	373
How to Succeed Commercially as a Huizhou Book Publisher, 1500—1644·····	Joseph McDermott (周绍明)	383

【 版刻与印刷术的传播及其影响 】

论覆刻本

姚伯岳

一、覆刻本的概念

近些年来，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中，越来越多地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同一种书的两个甚至几个看似几乎完全相同的刻本，其实并不是同一个版本，而是底本与翻刻本的关系。但是，过去的编目记录很少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而是将其大多著录为同一版本的不同复本。

确实，如果分别来看这一个个本子，或者将两个本子放在一起看得不够认真，都很难发现这些差异；可是如果细细比对，就会发现其间微小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这些不同之处绝不是由于后来刷印的原因所造成的，而是使用了不同的书版所致。很自然，人们立刻会想到用一个现成的名称——“影刻本”，来描述这种版本类型。但是仔细一琢磨，发现又不是那么回事儿。

通常，影刻本的概念，是指那些底本年代久远、雕印精美、流传稀少，故而不惜工本，用特殊的方法将其逼真地复制翻刻印刷而成的雕版印本。

古代雕版印刷的第一道工序是用毛笔沾墨在纸上书写版样，然后将版样正面用浆糊粘贴到已修制好的木版上，使版样上的图文墨迹渗入到木纹里，待纸稍干后擦去纸毛，用刻刀按照字体、栏格的墨迹一丝不苟地雕刻。而是否依照底本原样进行复制的关键也正在这第一道工序上。

要依照底本原样复制新的刻本，可以选用下面两种方法进行版样的制作：一是“临”，就是对照底本尽可能原样抄写；二是“摹”，就是将半透明的薄纸覆于底本书叶之上，照原样摹写，有时甚至采用最能忠实反映底本原貌的先双钩后填墨的双钩廓填法。用上述方法制版，如果要严格区分的话，用“临”的

方法复制而成的刻本可称之为仿刻本，而用“摹”的方法复制而成的刻本才应称之为影刻本。

但前面提到的那些刻本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类型。因为：

(1) 它们的底本一般刻印年代并非久远，流传未必稀少，版本面貌也不一定精美，没有必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逼真地复制它们。

(2) 它们对底本的翻刻复制肯定没有采用“临”或“摹”的方法，因为两者的字体太相像了，用“临”或“摹”的方法都是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根据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工艺，这种翻刻复制方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将原书底本拆成散叶，将一叶叶原书纸叶分别粘贴到木版上作为版样，照原本的版式、字画原样雕镌，制成新的书版，然后刷印。

采用这种翻刻复制方法不必重新书写版样，省去了摹写的步骤，同时还可以避免翻刻时容易产生的文字错误，因而也简化了文字校对工作，可以极大地节省图书出版成本，并保证了图书的出版质量。

由于越来越多地发现古籍中这种特殊类型的翻刻现象，笔者开始考虑给这种版本类型起一个合适的名称。

前面已经说过，“影刻本”、“仿刻本”都有其特殊的含义，不适合用来称呼这种版本类型。

在古近的古籍书目或文献记载中，时常可以看到有一种“覆刻本”的说法，一般都是指模仿某一底本而重新刻印的本子，其实说的就是“影刻本”或“仿刻本”，其间的含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这几种说法过去是混用的，被看作是同一事物的各种不同名称。但在当代图书馆古籍编目界，“覆刻本”的说法却很少见，而基本被“影刻本”的规范名称所取代。

于是笔者设想，是否可以借用“覆刻本”的说法，赋予其专门的涵义，用来指称这种利用原书纸叶直接上版刻印而成的特殊类型的翻刻本？这是因为：

(1) “覆刻本”的说法符合其固有的忠实复制原书底本的本义。例如清张惠言编《七十家赋钞》六卷一书，最早为清道光元年（1821）合河康绍镛刻本，后来清光绪成都宏达堂采用将原书直接上版刻印的方式重刻该书时，即在版心下方明确镌“宏达堂覆刊”五字。

(2) “覆”可以理解为是将原书纸叶直接粘贴覆盖到木版上进行雕刻的动作和行为，是一个生动形象反映这种雕版印本复制方法的字眼。

(3) 这样一来，“影刻本”、“仿刻本”、“覆刻本”各有所指，可以很清楚地将雕版印本的三种不同复制翻刻方法区分开来，而给予人们明确的认识。

上述三种复制方法所应用的场合也是有所不同的。

仿刻法一般是在对复制效果是否逼真方面要求不甚严格时采用的，故仿刻本与底本有一定的差距，视之为一般的翻刻本也是可以的。

影刻法大多是因为底本精善珍罕，刻印者欲忠实反映原本面貌，以致不惜工本费时费力而为之。如清中期黄丕烈辑刻《士礼居黄氏丛书》，清末黎庶昌辑刻《古逸丛书》，清末民初贵池刘世珩辑刻《玉海堂影宋丛书》，其中所收录的影刻本，其底本都是珍贵无比的古籍善本，许多甚至是孤本，当然不可能毁掉原本来进行复制，只能采用“影摹”甚至“双钩”摹写的方法来制作版样。影刻费神费力，成本不菲，复制效果较仿刻为好，虽然也偶有传刻失真，或形似而乏神似的现象存在，但相较而言，确实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古籍善本复制再造方法。

至于覆刻法，则是在原本既非珍罕难得但又需要大量复本的情况下才予采用的。毁一本书以换得千百本书，在原本的价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为了省时省工，也还是合算的。更何况在反映原本的逼真程度方面，与仿刻和影刻二法相比，覆刻法的效果亦为最佳。

事实上，笔者在拙著《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一书中，已经将这类版本称之为覆刻本，并归入“影刻本”的范畴。今天看来，这个见解虽有独到之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覆刻本的发现，笔者感觉有必要将覆刻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版本类型单独提出来，以加深人们对这种图书翻刻方法的印象，明确对这类版本的认识。

二、覆刻本的源流和种类

覆刻这种图书翻刻复制方法滥觞于何时，因为缺乏实物的参照，还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但一般说来，同时代的版本因为比较容易得到，所以采用覆刻方法翻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再者，覆刻本身是一种简省取巧的雕版印刷方法，在雕版印刷技术上并无任何特别之处，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应用的早期阶段，就会有覆刻本的出现。这一点也可以从宋初《淳化阁帖》的翻刻情况得到印证。《淳化阁帖》十卷，初刻于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名虽曰上石，实镌刻于枣木版上。该帖虽篇幅庞大，但仅在宋代就有数十种翻刻，大都是按原样翻刻。其他在《淳化阁帖》基础上增减成帖的《潭帖》、《大观帖》、《绛帖》、

《汝帖》等，相同部分也多是按《淳化阁帖》的原样翻刻。这些翻刻本中应该不排除有用覆刻方法进行翻刻的。

又如新近收入《中华再造善本》的元大德七年（1303）姚燧刻本《校正刘向说苑》一书，其版式字体面貌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残本《说苑》几乎完全一样。书后有姚燧弟子云谦跋云：“宪使牧庵先生暇日出示刘向《说苑》，有益后学，俾绣之梓，以寿其传，诚盛事也。”大德七年距宋代并非十分久远，很有可能是采用了覆刻的方法，否则二本不会如此相像。

覆刻的现象在明末就比较多见了。当时覆刻的主要对象是明代的著作。

如明陆楫辑《古今说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云间陆氏俨山书院刻本，明末有覆刻本，下书口仍镌“俨山书院”。

明陈深所辑《诸子品节》五十卷，明万历十八年（1590）金陵周竹潭初刻，半叶9行20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单鱼尾，版框高19.7厘米，宽14厘米，眉上镌评。明末即有人据之覆刻，版式字体与之毫厘不爽。

明刘侗、于奕正修《帝京景物略》八卷，初刻于明崇祯八年（1635），稍后即有覆刻本。

清代据明本覆刻的现象就少得多了，而且大多发生在清初。如：

明张居正撰《张太岳先生集》四十七卷，该书以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陵唐国达刻本为最有名，清初有据之覆刻者，线装16册2函。

宋鲍彪校注、元吴师道重校的《战国策》十卷，明万历九年（1581）张一鲲刻本质量较好，清初杭州二余堂便据之覆刻。线装8册，半叶10行21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内封题“高氏原本”、“武林二余堂重刊”。书前有序说明覆刻情况，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清代康熙年间刻印的本子质量较高，所以当时以及后世对康熙间刻本进行覆刻的现象屡见不鲜。

如清王士禛撰《居易录》三十四卷，初刻于康熙四十年（1701），半叶10行20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康熙间即有据原本覆刻者。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两个本子都有收藏。

清邵长蘅撰《古今韵略》五卷，半叶9行14字，小字双行28字，细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商丘宋荦初刻，现已发现两种康熙以后的覆刻本。

明唐汝询选释、明吴昌祺评《删订唐诗解》二十四卷，清康熙四十年（1701）诵懿堂本甚佳，半叶9行21字，小字双行同，单黑鱼尾，左右双边，我至少发

现有 3 个面貌极为相似的不同版本，均为覆刻本。

清末战祸不断，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江南糜烂，藏书损失惨重，旧家所藏书版大多毁灭，即使是道光间和咸丰初年的刻本也所存无几，所以同治、光绪间据道光和咸丰初年版本覆刻图书的现象非常普遍。如：

明沈德符撰、清钱枋辑《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有清道光七年（1827）姚氏扶荔山房广州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该刻本的清末覆刻本，线装 24 册。

清方苞撰《望溪先生全集》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补遗二卷，年谱一卷，年谱附录一卷，清咸丰元年（1851）桐城戴钧衡刻。但原刻本少见，常见的是清末的覆刻本，线装 16 册。

宋徐锴传释《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有清道光十九年（1839）祁氏重刊本，清末又有该本的覆刻本，线装 12 册 2 函。

不仅一般的刻本覆刻现象比较普遍，刻本中的套印本也有覆刻现象，如梁萧统纂、唐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海录轩刻印有朱墨套印本。其后大文堂据之覆刻，线装 16 册，内封题“大文堂藏板”，下书口仍镌“海录轩”。

还有据活字本覆刻的，如：明刻本宋彭叔夏撰《会通馆印正文苑英华辩证》十卷，系覆刻明正德元年（1506）华氏会通馆活字本。

书画、地图的重刻描摹难度比较大，而覆刻的方法比较简便，所以也喜欢使用覆刻的方法。如：

清上官周绘撰《晚笑堂竹庄画传》，线装 2 册，书前有清乾隆八年（1743）上官周序言刻书事。该本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 3 个不同的清代覆刻本。

清马揭、盛绳祖纂修的《（乾隆）卫藏图识》一书，线装 4 册，最早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稍后即有覆刻本行世。

清董方立绘《皇清地理图》，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线装 3 册 1 函，系清同治十年（1871）广州华文堂据清咸丰六年（1867）长沙胡氏日知斋本覆刻。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自唐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仍然大量翻刻中国图书，其中采用覆刻方法也很多。如据传是曹操等人所注的《孙子十家注》十三卷，北京大学馆藏一种刻本，线装 4 册 1 函，即为日本嘉永六年（1853）据《平津馆丛书》本覆刻。

此外，明清许多古籍在后来利用原书版重新刷印时，由于有的书版断烂残缺，已不能使用，于是常常有将以前印出的原书相应书叶拆下，直接粘贴到木版上刊刻予以替补的情况。如明于成龙撰《河防一览》十四卷，明万历十九年